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淮扬文化研究文库

EXPLORATION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HISTORY
OF RECORDS OF DA DAI RITES

《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



孙显军◇著



EXPLORATION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HISTORY
OF RECORDS OF DA DAI RITES

《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

孙显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孙显军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4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2197 - 1

I. ①大… II. ①孙… III. ①礼仪 - 中国 - 古代 ②大戴礼记 - 研究 IV. ①K89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201 号

·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

《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

著 者 / 孙显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李 镇

责任校对 / 甄 飞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8.4 字数 / 316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197 - 1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获 2009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

总 序

文化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软实力日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是与其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更体现在文化发展水平，这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地理人文空间因素的日益重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出现了区域化研究的趋势。新世纪以来，区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较以往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锐利的前进态势，围绕各大区域文化进行的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也不断深入进步。从理论与现实角度考察，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实现区域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区域文化的优势，挖掘区域文化的资源。

江苏历来是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之地。新世纪以来，为发扬优秀区域文化精髓，建设文化强省，促进全省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江苏省人民政府制定了《江苏省 2001 ~ 2010 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江苏省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流派，要在加强研究、保护的基础上继

承创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在此思想指导下，江苏各地纷纷提出建设文化大市、文化强市的目标，学术界率先行动，出版了一批区域文化研究的论著，江苏省教育厅则及时地批准成立了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等一批区域文化研究的重点基地，以推进区域文化的研究和深入发展。

江苏高校林立，各大学因其所处的具体地域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也归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特定的区域文化始终对大学的文化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大学所负载的学术、文化与社会责任也日益被推上了更高层次的战略平台。因此，研究、挖掘、整合区域文化使之与大学文化有机地融合，不仅对推动区域文化研究与发展，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构建区域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大学吸取特定区域文化精髓的过程，对创建大学自身的特色文化氛围、凝炼大学精神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所缺乏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大学不是一所好大学；同样，一所没有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大学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大学。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说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陈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泉。”

扬州大学所处的苏中地区，是淮扬文化的核心区之一。作为淮扬文化区域唯一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扬州大学具有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显著特点。学校集中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精干力量，发挥融通互补、协同作战的优势，继承发扬以任中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对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区域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挖掘整理其丰厚资源并赋予时代精神，阐扬其独特蕴涵并寻找其与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变革相结合的的生长点，以求对地方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江苏省人民政府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对扬州大学进行

重点投资建设的基础上，在“十一五”期间对扬州大学继续予以重点资助，主要培植能够体现学科交融、具有明显生长性且预期产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五大重点学科，其中包括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凝炼而成的“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这一重点学科的凝成体现了将江苏优秀的古代文化与灿烂的现代文明有机交融、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和发扬光大的理念，符合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已有的专业背景、研究基础和今后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追求。该重点学科包括“文学转型与区域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与区域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其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以任中敏先生别号命名的《半塘文库》和以区域名称命名的《淮扬文化研究文库》，总计 50 余种学术专著，计 1500 万字。“文库”是“十五”期间“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研究成果的新发展，汇集了扬州大学众多学者的智慧和学识，体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可谓是一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文化工程。可以期待，“文库”的出版将对当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文明”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出版之际，我们向始终支持和关心“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建设的教育部社科司、江苏省教育厅的领导及专家表示衷心感谢，对负责定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诸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衷心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丛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扬州大学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
发展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

序

田汉云

在儒家早期的文献积累过程中，产生的经传品目繁多，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十三经》以及《大戴礼记》、《国语》，其余散亡殆尽。

经传之存亡及其学之绝续，取决于后人的价值判断。《大戴礼记》得以传世，根本原因在于它可资考礼、有助治世。然而它的命运又颇为独特，一方面，它在古代社会的地位显然不如《十三经》显赫，历代官方从未将其著于功令；另一方面，它受重视的程度并不亚于某些经传。例如，《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历代说解近 40 种，而《穀梁传》仅 11 种。由此看来，今世学者如果不拘泥于它在旧时代未经官方列为正经正传的形式，不妨把它看做正宗经传之一。从专经研究史的角度说，《大戴礼记》传习史也是不应缺少的分支。近 30 年来，《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论语》、《孟子》、《尔雅》、《孝经》等专经研究史都有专著问世，而《大戴礼记》独缺。因此，显军的《〈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显然具有弥补薄弱环节的意义。

专经研究史的基本任务，是梳理一种经典传习的流变过程。《〈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业已深究原委。作者认为，西汉之世，《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因其同具保存文献之功而并传，至东汉后期经师对《大戴礼记》的重视已逊于《小戴礼记》；魏晋南北

朝,《大戴礼记》主要作为礼学资料而为学者征引,专门名家者寥寥无几;宋、元、明三朝,随着理学兴起,《大戴礼记》研究升温,其中有关心性之学的内涵尤为学者重视,其经典地位得到恢复与巩固;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礼学的复兴为本经考释创造出难得的机遇,书中所载古礼与三《礼》的互补性使之重新受到尊崇,文本诠释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显军关于《大戴礼记》传习史演进脉络的厘定是符合实际的。与其他经传相比,梳理《大戴礼记》传习史的脉络,有其特殊的困难。如果说,《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等经传的传习史研究往往苦于注疏浩博,治《大戴礼记》则苦于历代诠解之多寡严重不均。显军之所以能够描绘出《大戴礼记》传习连续不断的历史线索,往往得力于对文献资料的细心爬梳。他搜集散见于群书的零星资料,关注出土文献,用功既勤,所得亦富,而综理复深得要领。

专经研究史的又一基本任务,是评析历代经师的相关著述。经学研究的功能或预设目标之一,是为后续的经典诠释提供借鉴或参考。由于很复杂的原因,古代经师的经典诠释不免精粗杂糅。当代学人重注经典,对于充分发掘、利用儒家文化的精华,是完全必要的。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对经学遗产下一番去粗取精、取长补短、推陈出新的工夫。在这里,经学史家大有用武之地。经学史家对历代经解权衡得失,品鉴高下,需要吸取今人诠释的最新成果,同时也需要独立思考。在这方面,显军也作出艰苦的努力。其考两“戴记”之关系,先从戴德、戴圣行年、师承、际遇着手,再对两书内容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多有新意。例如,他指出大戴之亡早于小戴,其政治地位逊于小戴,大戴之书篇章繁重过于小戴,大戴偏于专守而小戴善于趋时,均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从而揭示出《大戴礼记》的影响逐渐不敌《小戴礼记》的原因。其论清代孔广森、汪照、王聘珍的《大戴礼记》疏释,涵茹其书而观精微,指出孔氏“援据精深”,汪氏“征引繁富”,王氏“义精语洁”,可称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真知灼见。

经学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重在探求真相，发明底蕴。价值判断不可废，但是必须以求真为根底。显军主张，学术史研究应当“放下传统经学、学术的门户之见”，这是很可取的。《〈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学风上的突出优点，即在竭诚求真。作者评析历代学者的《大戴礼记》著述，坚持以文献为根据，力戒拘守既有的结论而随声附和。学界论朱熹之学，一般认为他重义理轻考据。事实上朱熹研究礼学，也主张“借经通礼”。显军考察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指出该书有特殊性，其主要内容是集解与校释，所关注“重在仪式、规范的‘还原’”，至于礼制所含义理“尚少关切”，体现了朱熹经学“不废汉唐训诂”的一面。《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的代表作，值得关注。清代学者王懋竑《朱子年谱》及书后所附《朱子论学切要语》，基本观点之一即是认为朱熹之学达到义理与考据统一的境界。显军的结论可以与王懋竑之见相印证。以往学者论元明经学，多视为宋代经学孱弱的附庸。显军认为，就《大戴礼记》而言并非如此。他指出，元明之际，《大戴礼记》渐成专门之学，其义蕴阐发得到深化，经典地位得以巩固，如吴澄调和朱、陆之分歧，湛若水据礼文而探精义，都是《大戴礼记》学富有特色与成就的一家之言。凡此都可以证明元明学人的贡献不亚于宋儒。这一见解，对于宋明经学研究也是值得参考的。《大戴礼记》传习史研究，自宋至清是突出重点。在这近千年的历史时段里，学术思潮屡有巨变，就学风而言大体不离义理与考据之争。显军在两者之间无所偏尚，所主唯实事求是而已。秉持这一原则，既有利于他对前人积极成果的兼收并蓄，也有利于对前人治学经验的全面总结。

《〈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是显军数年来勤奋治学的结晶。披览之后，我深信这部著作是当代经学史研究的有效积累。显军还比较年轻，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我作为年齿稍长的同道，愿借此机会重温前人的两点治学经验以资共勉。清儒所谓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诚属为学之要言。治经学史，也是如此。同门

学友颇有致力于经学专门史者，如《周易》学、《诗经》学、《春秋》学、《周礼》学、《仪礼》学、《论语》学、《孟子》学以及《国语》学等都有专攻之人。诸君年辈相同，性情相契，切磋方便，互相帮助，有益于各成其学。刘盼遂先生《高邮王氏治学切要语》载，王念孙尝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句，至于感激涕零。王念孙以 89 岁高龄辞世，临终前月余，犹治《逸周书》。无独有偶，我们的老师祁龙威先生 80 多岁承担《清史朴学志》修纂，也以这两句格言明志。这就是真学者的风范，值得我们学习。以显军之聪明才智，倘能矢志不渝，定能卓然自立于学术之林。

2010 年 9 月 8 日于扬州柳湖南苑

自序

想来想去，还是要在前面写点什么。

最初的想法是考察清代的《大戴礼记》研究，因此先整理、录入了有代表性的七八家校注笺疏，如戴震《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与卢侍讲书》及《四库全书》卢注本，汪中《大戴礼记正误》，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汪照《大戴礼记注补》，王引之《经义述闻》，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孙诒让《大戴礼记诂补》，俞樾《群经评议》，于鬯《香草续校书》。同时通过检索清人文集笔札，找了些顾炎武、朱彝尊、臧琳、卢文弨、陈寿祺、钱大昕、段玉裁、顾广圻、阮元、章学诚等与《大戴礼记》有关的材料，希望以逐部著作的解读为线索，梳理出清代《大戴礼记》研究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在整个工作之前，当然有必要对清代以前《大戴礼记》的传承情况作一个铺垫性的回顾和概述。没有想到，这一回顾和概述写下来竟成了一大堆文字，而且竟耗去了大量的时间，要想不再推迟答辩，只好修改最初的计划，将就写成了初稿《〈大戴礼记〉传习考》。

传，既可以理解为有序的传承，也可以理解成无意的流布；习，既可以解释为一般的学习，也可以解释为带有专门性的研究。这个书名也许朴素了些，相对于内容而言倒还是较切题的，但它同时也将自己基本上限定在了传统考证学的范围，从而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丧失自己学科归属的危险。“考证不是任何人的专利”。考证，

一般而言与古典文献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而大凡与古典文献有联系的学科如历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等，都会借助于考证并且产生自己的学科考证学，如此一来，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献考证，反而只能在经典学科的夹缝中谋生。以《〈大戴礼记〉传习考》为例，应该属于文学还是应该属于历史学？它当然应该既属于文学又属于历史学，甚至还可以属于教育学——作为传统读书人的学习对象，它理应成为教育史的话题之一，相对于科举或选士成为教育史的重要范畴，理由要正当得多——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维护学科纯粹性的专家学者断然拒绝。而事实上，避开学术的谱系不说，单从话语系统来讲，它确实也不融于文学或者历史学，更不用说教育学了。就此而言，改成现在的名称——《〈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并不是要由外而内地整个改变既有的叙述方式，而仅仅是出于装饰、包装的需要。

因为，与诠释相呼应，不应该仅仅是事实的陈列，更多的、更主要的应该是对事实的追问。因此，与这个题目相呼应，完全可以加一个副标题：作为一般知识与作为学术课题的《大戴礼记》。作为一般知识与作为学术课题的《大戴礼记》在其传习过程中（或者说诠释史中）有着天壤之别：作为一般的知识，它仅仅是戴德、戴圣、大戴、小戴、两戴、两戴记、十四经等一些断裂的、零碎的甚或是作为炫耀或者必备的知识点的堆砌，因此它只要求了解；作为学术课题，则必须对这一堆名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探析，因此不仅需要专门的知识，而且需要近乎专门的钻研。再进一步，这两种状况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是否就泾渭分明地各自存续，没有重叠，没有交叉，没有彼此的影响？再进一步，所以有这样两种状况，其背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原因何在？或者说有没有话语权力的影响？即如保罗·博维所说：“形形色色的话语和体制构成了形形色色的高度知性化的文学研究传统；在这些话语和体制内，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和对抗性知识分子实践着自己的批评技巧”，而“即便是最坚定的修正论者，对立

性、对抗性最强的人文知识分子（不管他公开鼓吹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他们也都是在话语、体制和欲望的网络内进行运作；而且，在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批评方案中我们看得尤为清楚，话语、体制和欲望网络总是通过反民主的实践，以反民主的形式自我复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卢辩执志敢决地注了《大戴礼记》，但为什么以他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却最终并没有使它在经典中的位置发生位移。

试图理解《大戴礼记》的传习史或者诠释史，要比陈述它困难得多。举一个细微的例子，李光地曾称事实上是叔侄的两戴为兄弟，作为颇有学问根底的他何以会产生如此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一定要追寻个中原因，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李光地的知识树或知识序列或知识谱系，以弄清不同的知识在其中的位置和重要性，甚至弄清他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但这需要更多的耐心，更需要深厚的学养，同时也需要有尽可能多的李光地的个人资料。让人失望的是，我什么都缺少。再比如，有关朱熹的研究，一直是思想史、学术史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即便是杨简、吴澄、湛若水，也都不乏学术界的关注；但他们对《大戴礼记》的态度，却基本上都被忽视了。难道作为他们学术课题的《大戴礼记》对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如果发挥了些许作用，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假设能够仔细梳理、排比他们著作中的重要概念或范畴，也许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更为明显的是清代，不论是对《大戴礼记》的总体研究，还是对其中某些单篇的研究，成果都很丰富，但在所有的官私目录中，《大戴礼记》仍然附于《礼记》之后；不仅如此，像孔广森、王聘珍这样以治《大戴礼记》名世的经学家，在学术史——无论是断代史还是专门史上往往也不过具名而已。孔广森的情形似乎更特别，他以治《公羊春秋》和《大戴礼记》知名于时，几乎每一部当时的或此后的学术史著作都会提到他，但却很少有对他和他经学研究成果的专题解剖。那么，学术史家们对他的肯定和表彰为什么如此简单而缺乏分

析？到底是他的研究还是他的研究对象决定着他的学术史位置？如果真的是研究的对象决定着研究者学术史上真实的处境，需要清醒的就是我本人了。

本杰明·艾尔曼在探讨从宋明道学至清朝考证学的转变时指出：“从一个 20 世纪的观点来看，许多考证学者看起来就像是古物学家。但是如果古物学家是指埋首于研究一个业已死去的过去的令人兴味索然的学究的话，那么考证学者绝非古物学家。对于古人的重新发现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搜集的工作，而是一次与古人在思想上的邂逅。考证学者对古物、遗迹以及文本的嗜好，不仅仅是对那些罕见标本（unusual specimens）的痴迷，大体而言其实是相当‘哲学的’。”读来令人汗颜。

因此，想要真正地诠释好《大戴礼记》的传习史，目前的这部分内容只能算是它的前奏，而且实在太平面、太平淡了。几个很明显的欠缺是：除了试图弄清《大戴礼记》的成书和作者，我对《大戴礼记》文本的关注很少；除了偶尔在某些地方试图把《大戴礼记》的传习或诠释放到学术大背景中探讨，我对整个经学史或学术史缺乏深度关注；清代可写的内容很多，但现在却仅写了孔广森、汪照、王聘珍三家。

不止如此，研究过程中涉及的文献，几乎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版本问题。这固然是因为手头可选择的版本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乏版本方面的专门训练，还有就是自己的慵懒——我不喜欢到图书馆，而是通过朋友的帮助，尽可能地使用了电子文献资源。如此一来，虽然少了泡图书馆的时间，却给核对添了不少麻烦——但最后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逐一比对纸质文献核查了引文。

还有就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综述，境内的文献找到不少；境外比如港台，应该有不少，但限于条件，所知极为有限。

进一步的研究当然很有必要，而且一定也很有意思，但也需要更多的支撑，如学术素养的提升和专门的技术训练；也还依赖于更多的其他发现——设想一下，如果某一天，完整的全本《大戴礼

记》的竹简帛书被发现了，那将会打开怎样的一个全新的研究局面！

期待真有这样的一天！

最后除了感谢后记中提到的很多老师朋友，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胡阿祥教授，他在百忙中审读、修改了魏晋部分的内容，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还要感谢《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徐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学海》、《文史哲》的编辑同仁，由于他们的辛勤审读、核校、修改，论文中的一些章节得以先期发表。

孙显军

2010年8月8日于扬州补拙斋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大戴礼记》成书考	16
第一节 礼，礼经，礼记	16
第二节 戴德、戴圣及其关系考论	36
第三节 《大戴礼记》成书考	50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大戴礼记》渐受冷落	78
第一节 不列学官，渐受冷落	78
第二节 议礼修缺，时有传习	80
第三节 “庶纁前修”的《大戴礼记》卢注	90
第三章 隋唐：《大戴礼记》研究趋于沉寂	108
第一节 经学一统，罕见专研	108
第二节 异儒传习，不绝如缕	114
第三节 经史注疏，多见征引	118
第四章 宋代：《大戴礼记》研究渐受重视	128
第一节 重估价值，列十四经	129